當「野獸」遭遇「文明」

——評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

● 方萬鵬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產物——動物園不僅是一個容納動物的空間場所，還是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象徵，台灣圓山動物園即是在此背景下設立，而其百餘年的發展變遷史則構成了台灣地區動物文化史的一個精緻縮影。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2020）。

回溯動物與人類關係的歷史，「人猿揖別」是一個具有特別時間節點意義的象徵，它喻說人類自身脫離了動物世界，開始創造文字、文化和文明，動物亦開啟了與人類文明的遭遇歷程。在嗣後漫長的歷史中，或許是生發於自然世界的情感本能，抑或是帶有開發、征服自然的生存訴求，這兩種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人與動物的關係。一方面，人類躍居食物鏈頂端，依靠愈發系統的技術工具體系馴化、圈養、役使動物，並不斷拓展食物譜系邊界；另一方面，動物在人類社會當中的文化意蘊也得以生成並漸趨豐滿：猛獸隱喻權力，麋鹿象徵祥瑞。古代王朝朝貢和商貿體系下的動物流動，則別具政治、外交層面的意義。近代以來，隨着西方工業文明和動物認知科學的發展，動物再次遭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產物——動物園，它不僅是一個容納動物的空間場所，還是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象徵，吸引西方之外欽慕「文明」的國家和地區競相設立。台灣圓山動物園即是在此背景下於1914年設立，而其百餘年的發展變遷史則構成了台灣地區動物文化史的一個精緻縮影。

由是觀之，動物群體看似以相對弱勢的姿態被裹挾進入人類的

文明體系，但同時也無可爭議地成為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動物史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者已不再滿足於將動物視為人類文明敘事的附庸，抑或像環保思潮初興時那樣強調動物權利，而是呼籲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重繪動物歷史圖景，並發掘動物自身及其與人類文明交互的歷史能動性①。動物園作為動物與人類深度交互的一個觀察窗口，無疑是動物史研究理念踐行路徑的一個重要選擇，台灣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鄭麗榕的《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台灣動物文化史》（以下簡稱《文明的野獸》，引用只註頁碼）一書②，即是在動物史的視野下探討「野獸」遭遇近代文明的歷史著作。

一　近代動物園的歷史剖面

圓山動物園即今台北市立動物園，成立於台灣日據時期，是台灣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動物園。其發展史既有特定的動物文化背景，同時也遵循近代動物園發展的一般路徑。《文明的野獸》一書共分五章，分別探討並呈現了圓山動物園與動物文化、國家、戰爭、娛樂及教育、環境等相關的幾個歷史剖面。

第一章「動物園的文化背景」從動物圈養、表演和展示三個方面來追述以休閒、教育和科學研究為理念的近代動物園傳入台灣之前的動物文化。板橋林家等豪門大族在園林中對魚、鳥、鹿等的動物圈養體現了精英階層寄託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理想之個人喜好，雜耍、鬥雞等動物表演是民間傳承已久的節慶娛樂項目，而隨着十九世紀末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各地和台灣舉辦的博覽會中的動物展示則通常與殖民政府的農業經濟調查相關，例如場館內的水族館、動物園對所謂「蕃產」的展示。三者均可視為台灣近代動物園誕生的文化背景，亦各有其遠源。例如，傳統雜耍和小動物表演深受中國大陸移民台灣群體的影響，以大型動物表演為主要特點的馬戲團則是西式的，而博覽會及其餘興節目則受到近代日本



圓山動物園即今台北市立動物園。（資料圖片）

鄭麗榕的《文明的野獸》一書是在動物史的視野下探討「野獸」遭遇近代文明的歷史著作，分別呈現了圓山動物園與動物文化、國家、戰爭、娛樂及教育、環境等相關的幾個歷史剖面。